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第五十一辑（总第一五一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一辑(总第一五一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151辑 /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34-1544-9/K·1040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67101号

责任编辑:梁志安 封玉敏 封面设计:张守义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印 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00070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75

字数:206千字

印 数:3000册

版 次: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4.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民主斗争

- 我参加民主建国会活动的一些情况 徐崇林 (1)
我参加“民联”组织的回忆 苏从周 (22)
上海“大通别墅”聚餐会点滴 范尧峰 (27)

人物述林

- 两度相随蒋经国的经过 李以助 (30)

军事史苑

- 第一五〇师的组建和起义始末 方人熙 (64)
刘湘死后潘文华在四川的活动 郭造勋 (80)
我在战地服务团和励志社的经历 黄富强 (97)
参加军事督导组的活动见闻 邹继衍 (107)

抗战纪实

-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慰劳总会”工作片段
..... 张肩重 (119)
为支援救亡工作发售爱国奖券的始末 韦锡九 (124)

抗战中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刘良模 (129)
--------------------	-----------

工商史苑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坎坷道路	沈 堃等 (134)
五代经营的云南永茂和商号	李镜天 (147)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概况	张自立 (167)
我国铅笔工业的崛起	邹修庵 (173)

史海钩沉

伪天津市长温世珍时期群奸罪恶活动纪略 天津市政协“日伪时期史料”专题小组	(186)
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	周作人 (203)

体坛精英

盖斯特杯，你到底有多重！	邱钟惠 (213)
跳远项目的第一块金牌	邹振先 (221)
第一次夺得世界速滑冠军	王金玉 (226)
射击场上显神威	李亚敏 (234)
难以忘怀的冠军之路	吕 彬 (239)

民主斗争

我参加民主建国会活动的一些情况

徐 崇 林*

解放前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活动，我是自始至终都参加了的，我的回忆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民主建国会经过酝酿、成立、开展活动的阶段。第二阶段：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民建重庆分会进行公开和半公开活动的情况。第三阶段：1947年11月至1949年11月30日，民建重庆分会转入地下活动迎接解放的情况。

第 一 阶 段

一、民主建国会成立的过程

在抗日战争胜利和国共和谈的鼓舞下，陪都重庆的民族工商业界人士纷纷起来，要求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实现和平建国。刚从延安访问归来、与工商界、金融界有密切联系的中华职教社创始人教育家黄炎培，于8月21日偕同杨卫玉往访工业家和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负责人，与胡厥文商谈胜利后的动向和组织政团的设想，他们的志趣相同，都有同感。因此，又相约于同月28日同访经济学家章乃器，商谈具体组织问题。其后，分别以各种方式与有关人士交换意见，如个别谈话、三五谈心、座谈会、聚

* 作者时任民建总会理事，对外联络组副主任。

餐会等，又将意见集中起来，研究参考。

在聚会中大家各抒己见，谈的范围很广泛，涉及中国社会性质、当前形势、对抗战胜利后政治、经济问题的主张，以及建立民建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章乃器、施复亮和一些工商业者及大学教师，都谈了自己的看法。例如 1945 年 11 月初在江家巷迁川大厦举行了一次大型座谈会，座谈有关民主等问题，与会者发言踊跃，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在会上谈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

另一次在陕西街“华康”银行举行的聚餐会上，鄢公复谈起他在北京大学时，曾参加过五四运动，还参加学生游行扛过大旗，表示赞成争取民主。施复亮谈道，就他本人的经历来看，国民党政权不可能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大家必须组织起来，各种力量必须配合，才能争取民主权利。章乃器也概括他的亲身经历和与中共一些负责同志交换意见的情况，觉得要争取民主，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根据多次交换意见，在酝酿成立民主建国会的问题上，大家基本上统一了对下面一些主要问题的认识：

第一，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眼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工商业，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要消灭的是封建经济、殖民地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第二，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建立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制度，和平建设新中国。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并在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的条件下，实行军队国家化，不赞成军人干预政治。因此以后民建的章程中，明确制订出了不吸收现役军人加入的条款。

第三，抗战胜利后的外交政策，应实行联合苏美英法反对法西斯的和平外交政策。

以上有些意见，后来在民建章程中有所反映。我个人回忆，民建内部当时就有人觉得某些主张是有问题的，但大部分主张是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这就在当时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国民党划清了界线。事实上，民建会的一些主张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特别是对工商界的影响很大，有些人在实践中纠正了原有的不现实的想法。

大概在1945年9月间，章乃器就找我谈成立政治组织问题，我表示同意。我们初步交换了看法，接着就约在迁川大厦继续交换意见，除章乃器外，还有胡厥文和丁汉明（作记录）等，主要谈如何组织、邀约哪些人等。后来施复亮参加了座谈。有一次约了中央政治大学何永佑教授交换意见，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未来参加，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赞成中间路线，对不左倾、不右袒、不偏不倚的政治态度，我也不完全赞同。关于争取的对象，如周焕章等是我提出的，我还提出范旭东、吴蕴初等，认为他们是民族资本家，从化学工业方面来讲，当时有所谓“南吴（上海吴蕴初）北范（天津范旭东）”之称。本来他们都表示赞成组织民建会，但由于当时的客观情况，为了使所办企业能顺利进行，不便公开出面参加，只能暗中支持。这一时期的活动黄炎培没有参加，这可能是章乃器、胡厥文与联系的人交换意见后，他们再向黄炎培报告各方面的情况，进一步为组织民建会创造条件。

根据黄炎培日记记载：民建会筹备活动自1945年8月21日开始，到12月16日民建会成立，共进行了24次。集会地点以冉家巷为最多，因胡厥文、章乃器都住在冉家巷9号。我在这一段筹备期间，参加会议大约有十多次，其中能记得的有：

1945年12月2日午后在迁川大厦，迁川工厂联合会与《国讯》、《宪政》联合召开工厂与民主座谈会，黄炎培与胡厥文主持会议，到会31人，发言踊跃。沈钧儒、胡西园、胡厥文、陈伯康、施复亮、马雄冠、章乃器、余名钰、卫挺生、徐崇林、高功

懋、张雪澄、魏如 13 人发了言，各抒己见。这次座谈会对我发起民建会是很有影响的。

当晚，民建会开会讨论章乃器所拟的政治主张补充草稿，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徐崇林到会。黄炎培主持会议。

11 月 9 日晚民建会开会，章乃器、胡西园、胡厥文、施复亮、徐崇林、张雪澄到会。黄炎培报告大局现况。

11 月 16 日晚民建会开会，到会胡厥文、胡西园、章乃器、章元善、施复亮、徐崇林、孙起孟、张雪澄九人，胡厥文主持，议决：（一）假定 12 月 1 日开成立会。（二）推章乃器、施复亮、张雪澄、孙起孟研究政治主张（改称政纲）。

11 月 23 日午后，民建同人到“菁园”（黄炎培住宅）开会，到会胡厥文、章乃器、章元善、胡西园、徐崇林、张雪澄、孙起孟等，会毕会餐。

11 月 28 日下午，民建筹备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到会 30 人，推举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胡西园、孙起孟、章元善、施复亮、鄧云鹤、胡子婴、辛德培、黄墨涵、张雪澄、陈之一（钧）、徐崇林、周焕章 15 人为筹备干事，正式成立民主建国会筹备会。

11 月 30 日下午在“菁园”黄炎培家举行第一次筹备干事会，到会者周焕章、章乃器、施复亮、胡子婴、徐崇林、辛德培、张雪澄、陈之一、鄧云鹤、孙起孟、胡厥文、黄炎培。

12 月 5 日午后，在下黄学巷 15 号西南化工厂办事处开第二次筹备干事会，黄墨涵主持，通过章乃器所草大会宣言。

12 月 7 日午后，在迁川大厦举行第二次筹备大会，到会 51 人，其中有胡子昂、彭一湖、邓健中、伍丹戈、郑太朴、何永佑等是新会员。黄炎培担任主席。在这次筹备大会上决定于 12 月 16 日举行成立大会。

二、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

1945 年 12 月 16 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

会，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为主席团，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讲了话，还有其他工业界会员也发了言。

会场庄严隆重，情绪热烈。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政纲》、《组织原则》和《章程》，并用无记名投票，选出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王纪华、杨卫玉、孙起孟、王郅尘、俞寰澄、张澍霖、鄧云鹤、胡子婴、林汉达、庄茂如、章元善、王靖方、王载非、徐崇林、黄墨涵、萧万成、毕相辉、夏炎德、鄢公复、宁芷村、范尧峰、王孝绪、漆琪生、林涤非、姜庆湘、陈钧、文先俊、罗叔章、王之浩、周勛成 37 人为理事。选出李组绅、阎宝航、冷遹、董问樵、彭一湖、贾观仁、张雪澄、沈肃文、魏如、杨美真、萧松立、胡景文、董幼娴、邓建中、徐伯昕、刘伯昌、钟复光、刘丙吉、姚维钧 19 人为监事。

在成立大会中，有几件事我留有较深印象：

（一）民建会的成立当时没有获得国民党政府的认许，因此官方的报纸如《中央日报》等都未作报道，只《大公报》、《时事新报》和《新华日报》刊登了民建成立的消息。《大公报》用了较大较显著的版面登载，特别是刊登民建成立大会的《宣言》，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这是因为民建会的政治主张与当时的《大公报》有一定程度的同感，还有因《大公报》的记者高集是民建会成员，经章乃器迭次联系，该报编辑部方才同意登载《宣言》。

（二）对理、监事的选举，的确做到民主，以各人的意志用无记名投票选举的。我参加多次筹备工作，从未议论要选谁不选谁，而是强调“重在选贤与能”。结果，选出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等 37 人为理事，选举李组绅、阎宝航等 19 人为监事，理监事的名次，都是以得票多少排列，而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理事得票最多为 78 票，最少为 18 票；监事得票最多为 46 票，最少为 11 票。不是以过半数当选，而是以得票多者当选，这也说明它是没有组织的选举。

(三) 在成立大会上胡厥文略申：“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的目的为促进民主。”黄炎培宣称民建有几个特点：1. “不与人争”，“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之政党”；2. 拒绝现役军人参加；3. 提倡民主，“力避少数人负责”，因此“不采用固定领袖”的制度；4. 成员“虽以产业界及文化教育界人士为主体”，但“十分注意从业人员之培养”。章乃器发言称：“必须组织起来，与闻国家大事”，“要人民有权，才能政府有能”。

以上这些意见在大会通过的《宣言》、《政纲》、《组织原则》和《会章》里都有所反映，如组织原则明文规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会议制决定之”。因此，民建会没有会长或主席或主任委员等领袖，只选出常委会。后来才形成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三人负责制，后称三位召集人。解放后在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才根据正式修改后的会章，选举黄炎培为主任委员，胡厥文、章乃器等人为副主任委员。会章规定，现役军人和抗战时期勾结敌伪之汉奸不得入会。

(四) 参加民建会成立大会的人数问题。《大公报》新闻报道出席 200 余人，施复亮提出的是 134 人，大会签到为 93 人。当时的出席者，是以产业界和文教界为主体，二者人数可能大体相等。《大公报》的报道数字可能大了些，但不止 93 人。施复亮写《民建八周年》时说，成立大会时，签名发起的共 134 人，他曾向我们谈过，是有根据的。另外当时有些人士虽然参加了民建会，但要求不公布姓名，特别不能在报上公布。我介绍的一些人就有这种情况的，由于当时的处境，也可以理解。《大公报》记者高集参加民建会，是章乃器联系的，但成立大会时所列名单共 109 人中就没有高集。因此，很可能当时到会者中就有人没签名。

三、设立机构

12 月 19 日午后，在重庆江家巷 1 号迁川大厦举行第一次理监联席会议，公推李烛尘为主席，决定了暂假迁川大厦内办公，

互选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 11 人为常务理事，推李烛尘为下届召集人。互选李组绅、冷遹、彭一湖、张雪澄、刘丙吉五人为常务监事，推彭一湖为下届召集人。

12 月 20 日第一次常务理事联席会议通过设立各办事处、组，并推定各处、组主任、副主任：

秘书处：主任孙起孟，副主任何尊梅、范尧峰。

财务组：主任黄墨涵，副主任鄢公复。

会员组：主任章乃器。

分支会组：主任杨卫玉，副主任温仲六。

言论出版组：主任施复亮，副主任毕相辉、伍丹戈。

技术研究组：主任胡厥文，副主任鄧云鹤、魏如。

事业推广组：主任章元善。

对外联络组：主任胡西园，副主任徐崇林。

机构健全后，民建会积极开展活动。会址设在重庆江家巷 1 号迁川工厂联合会内，办公室是木结构的平房，外面一个堂屋作为会议室。开展活动的经费是捐募筹集的，工作人员来自各方面，都是义务工作。大家在反对国民党、争取民主等政治要求一致的基础上，工作起来比较积极，比较协调。孙起孟负责秘书处的工作，协调各方面非常细致。会内一开始就建立了文书的收发管理制度，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建立民建宣传工具——《平民周刊》。胡厥文、黄炎培、黄墨涵为发行人，施复亮为编委召集人。首先发刊的《民建成立纪念专刊》是第一期，1946 年 1 月 12 日出版；《平民周刊》第二期 1946 年 1 月 19 日出版；第三期 1 月 26 日出版；第四期 1946 年 2 月 9 日出版。《平民周刊》在重庆先后出版了四期，发表了当时民建会核心成员写的 20 余篇政论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民建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倾向，对于新会员及工商界了解民建会组织的性质和政见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四、旧政协期间的政治活动

(一) 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及各界人士

1946年1月8日，即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民建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公开举行茶话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及各界人士，报告民建会成立经过及政治主张。中共代表出席的有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方面有于右任、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社会贤达代表王云五、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及各界人士左舜生、胡子昂等百余人。

先由常委彭一湖说明本会成立宗旨后，即由常委章乃器提出民建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八项意见：(1) 为表示会前的诚意，国内军事冲突必先停止，并先全部赋予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通信等基本自由，实现释放全部政治犯、政党合法化和特务机关的解散。希望第三和第四方面的代表，以上述各项之实现为出席会议的先决条件。开会后亦应先讨论此类问题。(2) 会内须有专家顾问的协助，会外必须组织军事考察团。据悉，中共及民主同盟已向政府方面要求，每方面派顾问三人列席会。(3) 会议应完全公开，记录应随时发表以便人民自由批评，并向会议提出建议。(4) 国民党应先开放政权，改组或建立最高政权行政机构。(5) 为达到军队国家化，必须大量裁兵，官兵必须脱党，军权交给无政党关系的文人。(6) 为保持未来宪政的圣洁，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必须修改，代表必须重选，宪法必须重新起草。(7) 过渡期的共同纲领内容，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外，还应包括经济民主化。(8) 会议并应检讨当前的复员问题和经济政策。

章乃器最后并称，会议必须成功，否则下一步就是国际友人的干涉了，希望各位代表先生，抱必死的决心，以完成这项历史任务。

常委黄炎培因病未出席这次招待会，由杨卫玉常委代为宣读他的书面致词。

来宾发言的有于右任、邵力子、褚辅成、董必武、张东荪、陈启天、郭沫若、梁漱溟、胡霖、章伯钧、缪嘉铭等 12 人。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民主建国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初步意见，首先在《新华日报》登载，可见我们对贵会的态度。贵会所提意见，大体与本党向政治协商会议所提出的相同。表示支持。”他又说：“容忍与互让是有限度的。政治协商会议必须先解决停止冲突的问题，然后会议才有意义。对于宪法问题，则认为天下无不可推翻与修改的宪法，如存有不可修改的想法，必为妄想。而为百年宪政基础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应特别慎重地从长计议。”

最后，常委胡厥文在答谢来宾的致词中，综合各代表的议论说，党派的利益可以互让，但国家基础及人民之基本权利，是不能作为政党之礼物与牺牲品的。

第二天（1月9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均以较大的篇幅作了报道。这次招待会是民建会公开活动的序幕，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影响很好。

（二）积极参加沧白堂演讲会

旧政治协商会议是根据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议纪要》的规定，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2 月 1 日在重庆举行的。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民建会主要成员黄炎培、李烛尘虽不是民建会产生的代表，但他们的言行必然反映民建会的主张，其他不少民建成员在会议期间也活动频繁。这些活动有的有明显的民建组织色彩，有的则是以个人身份出现，但与民建也不无关系。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在“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等斗争中，民建会的组织和成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简称“协进会”）是 1946 年 1 月 11 日成立的。这天晚上，民主建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

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和救国会三个团体，邀请各界代表在江家巷迁川工厂联合开会。会议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主持。商讨成立了协进会，并选出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李德全、茅盾、曹孟君、孙起孟、罗叔章等 35 人组成理事会，下设秘书、联络、新闻三处。参加工作机构的民建成员有胡子婴、章乃器（秘书处），罗叔章（联络处），田钟灵、温仲六（新闻处）。决定：一、每日举行“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到会报告当天下午开会情况，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二、在最近期内举行“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

从 1 月 12 日到 27 日，协进会举行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前三次是在江家巷口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合作会堂”举行，因场地较小，听众很多，挤得水泄不通。为了接纳更多的听众，从第四次起就改在沧白堂举行，因其厅堂较大，院落宽敞，参加群众更为踊跃，每次总在千人以上，特务的扰乱和破坏也就益愈加剧。

第一次各界民众大会于 1 月 12 日晚在“合作会堂”举行，由章伯钧作报告。第二次于 14 日晚举行，民盟代表罗隆基作报告，大会主席施复亮抨击国民党改组政府的办法是“彻头彻尾维持个人独裁”。第三次于 15 日晚举行，由史良主持，民盟代表张申府和社会贤达代表李烛尘作报告。这几次大会，虽然都有特务流氓混在会场，发嘘声掷烟头，进行骚扰，但由于群众情绪十分高昂，并未能阻挡大会的热烈进行。

第四次大会 16 日晚改在沧白堂举行，由阎宝航主持，民盟代表张东荪和社会贤达代表郭沫若作报告。由于特务捣乱，大会未能终场。第五次大会 17 日晚举行，由李德全主持，原请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青年党代表曾琦到会作报告，曾琦未到，托李璜（青年党负责人之一，不是政协代表）代表讲话，邵力子是在李璜讲话之后到会。当时会场秩序已乱，这次大会又被特务捣乱而中断。

特务捣乱特别严重的是 18 日晚举行的第六次大会，由李公朴、刘清扬、钟复光任主席团主席。请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共产党代表王若飞作报告。王若飞在会上揭露了蒋介石提出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实质，是诬蔑共产党“拥兵自重”，搞“封建割据”，妄图一口吃掉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中统特务刘俊山等敲起小锣，拿起木棍、石块向讲台打去，会场秩序大乱。许多进步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就有民建会员）立即奔向讲台，在石子纷飞中，大家奋不顾身，把王若飞送上轿车安全离去。

第七次大会 19 日晚举行，由章乃器主持。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和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作报告。特务打手五次甩石头、放爆竹，致使一个青年左眼受伤。第八次民众大会 27 日午后 2 时在沧白堂召开，到会群众达 3000 余人，大会由阎宝航、李公朴、章乃器主持。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仍不到会。首由中共代表王若飞讲话，然后由郭沫若作报告。报告完毕，场内有人叫喊，呼打之声不绝于耳，会场木椅全被捣毁，以致听众人心惶惶。

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但在政协会议期间，民主建国会还单独先后举办过三次“政治协商会议讲座”。第一次是 1 月 13 日在迁川大厦举行，由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黄炎培和社会贤达代表李烛尘主讲。第二次是 1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迁川大厦举行，由社会贤达代表缪云台和左舜生、何永佶主讲。第三次是 1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在沧白纪念堂举行，由施复亮主持，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勱报告宪法草案协议。这些讲座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也同样遭到特务流氓的扰乱。

特务不仅捣乱会场，还非法抓捕和毒打“协进会”工作人员。1 月 24 日晚，新闻处负责人田钟灵夫妇与新闻记者李学民，在回家途中被暴徒行凶殴打，李学民受伤十余处。1 月 26 日“协进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章乃器、陶行知、胡子婴等相继发言，对“沧白堂事件”提出严正抗议。许涤新夫妇、罗叔章、朱

宝粹、徐崇林、田钟灵、徐守贞等都相继前往医院，亲切慰问李学民，加以声援。

（三）“较场口事件”

旧政治协商会议经历 23 天的反复斗争，终于就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达成协议，于 2 月 1 日闭幕。为了巩固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促使五项决议的贯彻实施，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业协进会、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等 23 个团体组成“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简称筹备会）。2 月 9 日召开最后一次筹备会，一致决定庆祝大会于 2 月 10 日上午 9 时半举行、由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徐崇林等 20 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并向大会报告筹备经过。柬请全体政协代表莅会指导，并请政协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勱、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到会讲话。2 月 10 日上午 9 时半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尚未到开会时间，国民党已按其预谋，在主席台上下，布满几百特务打手。特务刘野樵等向刚到台上的主席团成员李公朴、章乃器等挑衅，抢当大会主席，强迫立即开会。暴徒乘势大打出手，台上台下打成一片。中小工联会员（其中有些是民建会员）和其他有关团体成员竭力维持秩序，同那些反动家伙展开斗争。然而特务肆虐，暴徒逞凶，铁条乱捅，砖石横飞，拳脚交加，与会群众受伤、失踪的即达五六十人，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陶行知、马寅初等民主人士被打伤，以致造成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事件发生后，周副主席当晚即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新华日报》报道了事实真相，严词进行谴责。全市、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抨击国民党的暴行，并函电慰问受伤人士。

“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颠倒黑白，发表